

# 唐高宗政治權謀的再認識 ——兼論高宗朝的武則天

羅永生\*

## 摘要

二十世紀初，前輩學者仍以昏庸、庸懦以至傀儡等字眼形容唐高宗。但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對武則天研究所引發的討論，不同的看法亦開始出現。論述武則天在高宗朝沒有完全執政，唐朝軍國大政仍緊握在高宗手中。高宗的聰明才智雖不及太宗，但並非昏庸無能，他讓武后參與政事，亦非出于懦弱，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並非傳世史書所描繪為“軟弱無能”的君主。這些討論，給研究者帶來新的課題，如果我們不依從傳統的看法，認為高宗不是昏庸的皇帝，則日後武后臨朝稱制的局面，如何解釋？高宗廢王立武後，朝廷上有沒有形成一股屬於則天的政治力量？她與高宗在政見上，是否有分歧以至如部份論者所謂的有矛盾？簡言之，究竟她在高宗朝的二十八個年頭裡，擔任了甚麼角色，起了何種作用？我們甚而可以追問，她在這段日子的經驗，是否影響到日後她掌權的日子中的權術運用？史料的貧乏，使這些問題的探討有不少困難，但為要追求較合理的答案，重新考察和認識高宗朝的歷史，實有其必要。

**關鍵詞：**唐代、高宗朝、武則天

---

\*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

## 一、問題所在

唐高宗李治在位凡三十四年（650-683），是唐朝在位時間第二長的君主，僅次於唐玄宗，而較其父唐太宗多十年以上，但是高宗一朝歷史卻少為史家所注意。其主要原因，或與他去世後不久武則天便臨朝稱制，最後更篡唐立周。長期以來武則天被傳統史家冠以「狐媚惑主」、「牝雞司晨」、「女主干政」等說法，因而唐高宗亦得隨之而負起部份責任以至罪名。且看《舊唐書·高宗紀下》史臣評語：

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升旒宸，頓異明哉。虛襟似納於觸鱗，下詔無殊於扇暍。既蕩情於帷薄，遂忽怠於基扃。卒致盤維盡戮，宗社為墟，古所謂一國為一人興，前賢為後愚廢，信矣哉！<sup>1</sup>

《新唐書·高宗紀》的史臣贊曰，更不提高宗的政績而直接下斷語云：

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士大夫不免十之八九。……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sup>2</sup>

可知武則天的冒起成為影響唐高宗朝評價的一個近乎決定性因素。而高宗形象的每況愈下，亦可從「後愚」以至「昏童」的過程中略見一斑。

踏入二十世紀初，學術界雖受到西方新史學潮流衝擊，然而老一輩學者對此並沒有提出太多新見解。如：岑仲勉、范文瀾、

<sup>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5，〈高宗紀下〉，頁112。

<sup>2</sup> 北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3，〈高宗紀〉，頁79。

王壽南、邱添生等曾以昏庸、庸懦以至傀儡等字眼形容唐高宗。<sup>3</sup>談到高宗朝時，部份通史作品更輕輕帶過，在討論過唐太宗後便跳到武則天，原因是他們認為武則天執政近半世紀，她才是推動歷史的主角，唐高宗李治只是虛有其名。<sup>4</sup>但隨著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掀起對武則天研究所引發的討論，不同的看法亦開始出現。何汝泉首先撰文指出基於武則天在高宗朝的記載中，幾乎完全沒有涉及她參與軍事、民族和經濟等方面活動的痕跡，因而推出武則天在高宗朝沒有完全執政，唐朝軍國大政仍緊握在高宗手中的結論。<sup>5</sup>趙文潤認為，高宗在位期內，「生產在發展，疆域有開拓。他的聰明才智雖不及太宗，但並非昏庸無能，他讓武后參與政事，亦非出于懦弱，其歷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sup>6</sup>王炎平肯定高宗本身的能力及其與則天的政治關係。<sup>7</sup>曾現江主張高宗只是「懦而不昏」。<sup>8</sup>楊劍虹論述高宗政績之餘，更力主他不僅完成了唐太宗的未竟之業，解決了國家和社會的困難和問題，而且有所更新和發展。<sup>9</sup>孟憲實則反覆申論高宗是「外圓內方，胆大心細」極具政治智慧，但卻被傳世史書刻意描繪為「軟弱無能」的君主。<sup>10</sup>

這些討論，給研究者帶來新的課題，如果我們不依從傳統的看法，認為高宗不是昏庸的皇帝，則日後武后臨朝稱制的局面，如何解釋？高宗廢王立武後，朝廷上有沒有形成一股屬於則天的政治力量？她與高宗在政見上，是否有分歧以至如部份論者所謂

<sup>3</sup> 如：岑仲勉《隋唐史》稱高宗為「庸懦」，（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127。王壽南《隋唐史》形容高宗是「形同傀儡」，（台北：三民書局，1986），頁125。邱添生亦稱高宗為「武后傀儡」，見高明士、邱添生、何永成、甘懷真合著《隋唐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8），頁190。其他持類似看法的學者尚有：雷家驥，《武則天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sup>4</sup> 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三編》（修訂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傅樂成，《隋唐五代史》（台北：眾文圖書股份公司，1985）。

<sup>5</sup> 何汝泉，〈關於武則天的幾個問題〉，《歷史研究》，1978年第4期，頁63。

<sup>6</sup> 趙文潤，〈唐高宗「昏懦」說質疑〉，《人文雜誌》，1986年第1期，頁89-94。

<sup>7</sup> 王炎平，〈論「二聖」格局〉，收錄中國唐史學會編，《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頁196-204。

<sup>8</sup> 曾現江，〈唐高宗新論〉，《許昌師專學報》，2001年第4期，頁79-83。

<sup>9</sup> 楊劍虹，《武則天新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sup>10</sup>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的有矛盾？簡言之，究竟她在高宗朝的二十八個年頭裡，擔任了甚麼角色，起了何種作用？我們甚而可以追問，她在這段日子的經驗，是否影響到日後她掌權的日子中的權術運用？史料的貧乏，使這些問題的探討有不少困難，但為要追求較合理的答案，重新考察和認識高宗朝的歷史，實有其必要。

## 二、皇太子時期的李治

高宗登位，是唐朝君主繼承問題上少有未發生流血政變的一次，但這並非表示高宗在得位過程中沒有出現過政治鬥爭。據目前史料所見，唐太宗對同是長孫皇后所出四子魏王李泰的偏心，引起太子承乾的恐懼，最後承乾竟效法乃父，企圖聯合叔父元昌等武力奪位，結果失敗，承乾被廢，元昌被殺，成為王位繼承問題上的第一批犧牲者；其後太宗為了避免將來再出現兄弟鬥爭的局面，最終幽禁李泰，外徙均州，同黨流放，成為第二批犧牲者。而晉王李治作為長孫皇后的第三兒子，在長孫無忌的支持下成為皇太子。<sup>11</sup>

李治成為皇太子時十六歲，有關李治被立為太子後的事跡，史載不多。《舊唐書·高宗本紀》初段所記強調他的孝德，總之是接近一位前途有望君主的樣板。應該注意的是，貞觀十五年（641）以後的實錄由長孫無忌監修，而他支持李治最力，主因當是他作為舅父可以保有和享受權力，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其中有關他自己的部份與及有關李治的部份，大多極力強調可取的一面，例如目前所見有關李治為太子時表現，莫不仁孝非常，太宗遠征時，他「悲啼數日」，回來身體不適後，又不離左右，甚至「旬日之間，髮有變白者」，<sup>12</sup>我們不能肯定這些今日看來難以相信的行為或許有欠真實，但卻懷疑這位仁愛的皇太子在這段時期

<sup>11</sup> 參孫國棟，〈唐貞觀永徽間黨爭試釋〉，收錄《唐宋史論叢》（香港：龍門書店，1980），頁1-16。

<sup>12</sup> 見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27，頁296-297；另外有關高宗為皇太子時事跡，亦可參同書卷256至261〈儲宮部〉所載。

何以有機會和心情去和父親的後宮才人武氏搞不倫關係，<sup>13</sup>進而考慮同時期的其他記錄中出現曲筆的可能性。有論者便曾懷疑，記述唐太宗如何決定立李治為太子一段文字，可能出於溢美長孫無忌，因而有不實之處，即記錄誇大了長孫無忌本身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而從同一記錄所載李泰提出以自己百年後殺本身兒子以傳位李治，也可以看出太宗在廢承乾後也曾考慮以李治為繼承人的意思。<sup>14</sup>

太宗取幼子李治而放棄次子，主要是不希望兒子間出現黨爭的情形。正是二子之爭的教訓，使他晚年十分注意防範大臣言語和行動，稍不如意，即加以清除。不少高官，便成為貞觀朝皇位保護措施下的第三批犧牲者；如劉洎、張亮的被殺；已經去世的魏徵，失去名譽；蕭瑀、崔仁師等失去官職，雖然前者一度復位。即如房玄齡、馬周、李勣等老臣，亦似乎失去君主過去對他們的信心。主要權力漸集中在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手中。<sup>15</sup>前者大力支持李治而放棄同是自己外甥的李泰，主要或是因李泰所組織的班底乃以功臣子弟為主，而長孫無忌並無參予其中。<sup>16</sup>為了保持本身權位，無忌不得不改為向幼子李治動腦筋，希望從中可以為自己建立起政治資本。褚遂良出身南方，以文才與見識為太宗賞識，他在繼位問題中似乎未有明確的表露支持李治立場，卻是第一個提出要解決晉王問題的大臣，他後來在短短幾年中，從正五品上的諫議大夫，冒升為正三品的中書令，相信與這種唐室本位的態度，實際上也就是支持李治的態度有關。

在这一切為他政治前途鋪路的改變中，年青的李治並不容易

<sup>13</sup> 參盧向前，〈武則天與劉洎之死〉，《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版）》，2007年第3期，頁84-90。

<sup>14</sup> 見胡如雷，《李世民傳》（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238-239。胡書分別引述了《舊唐書》卷65《長孫無忌傳》和同書卷80《褚遂良傳》，而較原始記錄可參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57，頁3058，但文中疑間有漏字。

<sup>15</sup> 有關太宗晚年廢立太子的討論，參袁英光、王界雲，《唐太宗傳》（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頁256-279；又有關太宗晚年用人，可參王吉林，〈從唐太宗的用人看貞觀年間宰相制度的變動〉，載氏著，《唐代宰相與政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31-94。

<sup>16</sup> 趙克堯、許道勳，《唐太宗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367。

發揮他的影響力。貞觀十七年（643）左右，太宗曾經因為苑西守監農囿不修而大怒，下令處死之，但得李治說項，雖然似乎沒有按照請依法推鞠，卻答而釋之。<sup>17</sup>未知李治是否察覺到父親晚年不易聽諫的脾氣，同樣的事情，未再出現史籍之中。同年十二月，太宗一度想替太子「選良家女以實東宮」，但李治卻派于志寧推辭，<sup>18</sup>可見他無意讓父親完全支配他的感情和家庭生活。然而司馬光把這段記錄安排在太宗懷疑太子仁弱的記載前，是令人意外和不解的。加上日後李治膽敢在父親有生之年即與宮中才人武氏發生關係，更可見到他性格一端。他在貞觀二十二年（648）為母親作了大慈恩寺，史載當時他「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剎數百具，奉安新後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樂柔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華幡，導引入寺」，<sup>19</sup>規模異常龐大，成為當時大事，似有替自己建立威名的意思。但高宗後來並無為父親建立起同樣佛寺，也令人考慮他在感情上較接近母親多於父親。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九載貞觀十九年（645）太宗征遼時，作為太子監國的李治曾下詔州郡，徵簡賢良，結果州郡舉了數百人。<sup>20</sup>而這亦不可能是他當時的唯一措施。總之，我們看不到有充份的証據，可以認定李治在太宗朝末年表現柔弱。由於地位敏感，皇太子一般不易於居儲時，在政治上有所發揮。導致今天我們確實難以了解作為太子時的李治的個人特色以至政治見解。這方面的記載只能等到他登上皇座，才較易見到。

### 三、永徽年間的高宗與立武氏為后

貞觀二十三年五月（649），唐太宗病逝，李治繼位，成為第

<sup>17</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61，頁3100。又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4，〈劉洎傳〉，頁2671，所載略同。

<sup>18</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97，頁6206。

<sup>19</sup> 元·釋覺岸，《釋氏稽古略》（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3，頁276。

<sup>20</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59，頁3078。



一個於建國無功的唐代皇帝。雖然唐太宗晚年已經為太子的接班作了不少部署，但新君的權力基礎仍需要各種方法和手段來加以穩固。在消極方面，李治或有防範威脅甚至反對其統治的行動出現的可能，而在積極方面，他積極建立起本身的班底，亦同時推行一些可以爭取民心的措施。高宗登位初期朝廷的所為，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太宗遺詔便是一個典型例子。自從秦朝趙高擅把秦始皇的封書改為遺詔後，到了隋代，遺詔似成了一種證明新皇帝權力來源的公文書，反映後人意願漸多於死者本身希望。<sup>21</sup>太宗遺詔內容較重要的結束部份：「諸王為都督刺史任者，並來奔喪，濮王萊王不在來限……遼東行事並停。太原元從人見在者，各賜勳官一級，諸營作土木之功，並宜停斷。」<sup>22</sup>濮王即李泰，不讓他進京奔喪原因，無非是提防他乘機死灰後燃。另外征遼東曾經引起部份地方不滿和反對。所以，停止征遼的軍事行動，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反朝廷行動的爆發，這相信是高宗或朝臣的主張，但儘管說是太宗為了保持朝廷安定而改變主意，也勉強可接受。值得細究的是，我們難以發現足夠的理由去解釋太宗會在死後賜勳官給「太原元從」。所謂「太原元從」，當指一班當年參與太原起兵，但由於較親李淵而在貞觀朝相對失意的文武官員。他們不少早去世，剩下的在朝廷上能起的影響早已不大，如果說太宗要防止這批人作反，他大可一早找些理由把他們除掉，而不必至死時才加封無實際職權的勳官，而加勳官也不見得可以令他們會去掉作反之心。觀乎後來高宗對這班人的待遇，遺詔所記應該是高宗為貞觀朝失寵的舊臣平反或拉籠的一個步驟。<sup>23</sup>

<sup>21</sup> 參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6，頁264，所載秦始皇賜書公子扶蘇事。而從兩《漢書》本紀可見漢朝皇帝死時不少有遺詔。而隋文帝遺詔見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2，〈高祖紀下〉，頁52-53。

<sup>22</sup> 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卷11，〈太宗遺詔〉，頁61。舊紀和《通鑑》均有引數句，後者刪萊王字，萊王待考。

<sup>23</sup> 有關太原元從及他們在高宗朝後期所受待遇，參黃約瑟，〈武士護事蹟另探〉，《食貨月刊》，13：9-10（台北，1984），頁20-40。

遺詔公布次日，高宗便把四位原在東宮帶職的官員升級，分別是：兼太子少師、禮部尚書于志寧為侍中，太子少詹事、兼尚書左丞張行成為兼侍中、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吏部侍郎、攝戶部尚書高季輔為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太子左庶子許敬宗為兼禮部尚書。<sup>24</sup>時朝中權位最高的是在貞觀二十二年正月成為檢校中書令、知尚書、門下二省事的長孫無忌，但他要等到高宗正式即位後，而且從疊州召回李勣，加封為特進、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二日後，始多添一個太尉的職位，並且由知尚書、門下二省事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sup>25</sup>同月中，李勣先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兩個多月後，又加官為尚書左僕射，成為貞觀十七年後第一位僕射。有論者以為這個變化是維持長孫無忌特權，以李勣為陪襯，<sup>26</sup>亦有學者認為這是太宗托孤的刻意安排，<sup>27</sup>然而無論其背景動機如何，只要結合前述四人的加官，實亦可視為高宗的手法，以自己熟悉的親信大臣，組成一種古代內閣，以平衡長孫無忌的影響。更令人注意的，是太宗朝末年權力顯赫一時，曾任中書令而似乎負責起草太宗遺詔的褚遂良，只有賜爵河南縣公而沒有其他晉升，他在永徽元年（650）雖然又封郡公，但同年底卻因小故而被貶為同州刺史。事情起因是由於他本身不正，「抑買中書譯語人宅地」，<sup>28</sup>且不論這是否作為小問題的借口，<sup>29</sup>但理解為高宗即位後無意重用他可是符合情理的。

總之，李治可說沿襲或追隨了太宗部份的安排：例如要安撫山東人心，相信沒有比把李勣派到洛陽的更佳辦法。同時李治縱然對長孫無忌沒有特別惡感，但無忌對其天子之位亦無威脅，所

<sup>24</sup> 見舊紀，原文于志寧官作兼太子少師，但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72，頁822作左庶子。又參嚴耕望，《唐僕尚丞郎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822。

<sup>25</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199，頁6268。

<sup>26</sup> 王吉林，〈從黨派鬥爭看唐高宗、武后時代宰相制度的演變〉，頁95-157。

<sup>27</sup> 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頁153-159。

<sup>28</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520，頁6210；又見同書卷515，頁6158。

<sup>29</sup> 參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載《文史探微——黃永年自選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203-219。



以沒有必要立刻清除他，相反年僅二十三的高宗未經沙場戰鬥，對軍隊的控制與國政及其他方面，均可能或需要倚重舅父。不過，從各人的官位升遷中，亦有蛛絲馬跡，可以看出李治對父親遺制，或有一定的抗拒感。但他要建立自己的權力體系，只能循序漸進，不能亦大概無需要操之過急，不過朝廷官員在這種環境下，便自然為了本身權益，多少出現類似聯系結派的情形。例如褚遂良在永徽三年（652）又任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重回權力圈子，背後支持他的，相信很可能就是長孫無忌，箇中情由，或與早一年于志寧與張行成齊升僕射和同中書門下三品有關。這一年登上相位的尚有從黃門侍郎新任侍中的宇文節和由中書侍郎升中書令的柳奭，前者出身京兆大族，在貞觀中曾為尚書右丞，後者亦曾在貞觀中為中書舍人，後來以外戚身份代褚遂良為中書令。<sup>30</sup>前者在政壇可說曇花一現，因為他牽涉入永徽四年（653）房遺愛謀反事件中，他最後死於桂州，或與他未有和褚遂良一樣在朝廷中有大臣支持他之故，再參考他在永徽三年七月曾與于志寧等數人同出任東宮職的事實，看來他與長孫無忌不一定有特別親密關係，而是得皇帝的看重而得提升。柳奭以外戚冒起，是否如黃永年所言，乃高宗任用自己親信向外戚爭權的手法，<sup>31</sup>但出於高宗多於長孫無忌主意當能成立。若然，則新皇帝登基三年，雖然不是完全大權在握，在朝廷的人事改動中應該也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長孫無忌亦不是全無動作。他經歷了政壇數十年，不可能不注意到本身的處境。永徽三年正月，史載他以「早請遜位」，<sup>32</sup>或是一種刺探皇帝反應的方法。有趣的是，請求不批准三天後，正是前述褚遂良回朝任吏部尚書和同中書門下三品的日子。三個月後，與他有點姻親關係的韓瑗任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sup>33</sup>

<sup>30</sup> 詳參後晉·劉昫，《舊唐書》，卷105，〈宇文融傳·附宇文節〉，頁3217；及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7，〈柳奭傳〉，頁2681。

<sup>31</sup>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頁1-8。

<sup>3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0。

<sup>33</sup> 據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05，頁4023，所記長孫無忌的從父弟操子

二人的得勢或可視為與長孫無忌有關，二人在同年九月立李忠為太子事採取同一立場可說是主要證據。<sup>34</sup>不過同年九月以中書侍郎加任同中書門下三品的來濟的晉升，是否由於同樣原因，則頗成疑問。由於他們二人後來均對武則天立后事提出異議，往往被視為長孫無忌一派。但按《舊唐書》卷八十本傳所載，他是貞觀十八年（644）時新置太子司議郎時的初任者，故與李治亦有一定淵源。<sup>35</sup>要注意的卻是，李治或許不願意見到舅父在朝勢力過大；同時長孫無忌也不想本身影響消失，微妙的卻是二人既是君臣、又是甥舅，更是姻親，長孫無忌的兒子長孫沖又娶了高宗的妹長樂公主，<sup>36</sup>彼此的關係自然不是長期互不相容的對立，甚至更多時候，存在合作和利益協調的關係。

最清楚的例子自是永徽四年春，所謂房遺愛謀反一役。據記載，似乎事情起於房玄齡二子房遺愛所娶的高陽公主，她妒忌大伯房遺直的封爵，誣告他「無禮於已」，<sup>37</sup>結果反而驚動朝廷，暴露本身反狀，另外同時牽入薛萬徹、柴令武、李元景、李恪等人。但史籍所載多為片面資料，事情是否果然如此，尚有可探究之處。值得注意的是薛萬徹、柴令武除了有與房遺愛一樣，是駙馬都尉外，三人尚有一共通點，就是與貞觀年間經營太子之位失敗被貶黜的魏王李泰關係密切，就如《舊唐書》所記：

時皇太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意，招駙馬都尉柴令

---

詮，有女名兄，為韓瑗妻。

<sup>34</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6，頁2824，但此處褚遂良與韓瑗官職均有誤。

<sup>35</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0〈來濟傳〉，頁2742。

<sup>36</sup> 參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83，〈諸帝公主〉，頁3645、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300，頁3532。長樂公主後葬昭陵，有墓和誌，見《文博》，1988年第3期報告：〈唐昭陵長樂公主墓〉，頁10-30，另有圖版。

<sup>37</sup> 目前交代事情較完整的當推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199，頁6279-80所記。餘只能散見各傳記：房遺愛（《舊唐書》，卷66，頁2467）、薛萬徹（同書卷69，頁2519）、李元景（同書卷64，頁2425）、李恪（同書卷76，頁2650）、柴令武（《新唐書》，卷83，頁3646、卷90，頁3774）。另外房遺愛得罪事又可見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934，頁11013，但文中作太宗，當有誤。

武、房遺愛等二十餘人，厚加贈遺，寄以心腹。<sup>38</sup>

這次所謂謀反事情，發生在李泰去世後不足一個月內，<sup>39</sup>故難免令人懷疑，事件是有一種有目標有預謀的行動。前面提到太宗死時，李泰不能參加葬禮，但高宗即位後，又為他「開府置僚屬」，表面看來是「特加優異」，<sup>40</sup>實際上若非一種使對方不起反叛之心的手段，便是變相軟禁。朝廷對房遺愛等人的打擊，當是看準了他們暫時群龍無首，因此先發制人，使李泰餘黨一擊而潰，也同時藉機去掉一些可能成為領導反對的人物，例如李治的叔父李元景和同父異母弟李恪。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負責主持這次審訊的，主要是長孫無忌。由於事情兼牽涉及皇室成員以及駙馬，以貞觀年間審鞠承乾謀反案為先例，<sup>41</sup>我們相信實際上應有其他人參與審訊，不過長孫無忌是主審則當無疑問。這個任命，說明了朝廷對李泰集團舊人的打擊，不一定完全出於長孫無忌，也可能與高宗有關。雖然《舊唐書》中李恪傳指出他是因長孫無忌所忌嫉而被誅，但若無高宗的肯首，無忌亦難獨斷獨行。<sup>42</sup>我們可以懷疑，由於有關記錄或源於武則天時期編修的《高宗實錄》，記述長孫無忌之時或有多少醜化之嫌，但我們仍得承認，起碼在永徽四年，朝廷仍有一定程度得倚賴無忌。如果說長孫無忌在清算李泰集團舊成員上立了一功，則同年褚遂良接替張行成為尚書右僕射，以至次年四月韓瑗加銀青光祿大夫，或可視為他影響加重的一個反映。但與韓瑗加官同時的尚有來濟，而被視為加入了長孫派的外戚柳奭，則因王皇后失寵而自動辭中書令職，改任吏部尚書。<sup>43</sup>不管他是否真的自動自覺請辭，總之他受到從皇帝而來的壓力卻無可否認。

<sup>38</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6，〈太宗諸子〉，頁2655。

<sup>39</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1。

<sup>40</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6，〈太宗諸子〉，頁2656。

<sup>4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6，〈太宗諸子〉，頁2649。

<sup>4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6，〈太宗諸子〉，頁2650。

<sup>43</sup> 各人官職變更，參舊紀，另外柳奭事又參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7，〈柳奭傳〉，頁2682。

由此看來，單從權力的角度來考察，武則天未登台前的高宗朝初期所見的李治，並不是一個柔弱的君主。由於年齡的差距，我們不否認他有意擺脫前朝老臣的勢力，不過由於本身的經歷，與及實際的需要，他未有很大的成功。我們亦不必只強調二者間的衝突而漠視雙方亦有共同的利益。由當時的情況來看，代表了元老重臣的長孫無忌的影響與高宗的權力，並無此起彼落的必然關係。他們之間若有矛盾，可說是任何權力組織下的必有現象。但在此期間，並沒有任何事情，足以引致彼此較尖銳的對立，直到永徽六年（655）的廢立皇后事件。

黃永年從皇帝與托孤老臣之爭解釋廢立事件，<sup>44</sup>趙克堯則從君相權力之爭看此問題，<sup>45</sup>楊增強以高宗把家事政治化的觀點來探討此問題。<sup>46</sup>然而黃氏認為事件是皇帝與老臣之爭的焦點，似乎誇大了事件重要性，也無法解釋來濟與韓瑗的反對，事實上，廢后事件中居於皇帝一方的許敬宗亦可算是老臣，老臣中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態度並不完全一樣，而到頭來棄官的老臣只有褚遂良一人。趙氏認為廢后事件揭開了君相權力鬥爭的序幕，則無疑忽視了褚遂良的初次外放，以至許敬宗在永徽初年的同樣遭遇等事件；而後來的權力鬥爭，是否全是君相權之爭，亦是可以討論的。楊氏主張高宗處理本屬個人情感糾葛的家事問題時，因李義府的介入而轉化為國事化處理，最後以李勣之言又復回到家事化處理方式來解決問題，更乘勢把事件擴大，作為清除反對派的藉口。不約而同地三位學者均從皇帝與大臣間的角度去討論廢立事件，無疑是肯定高宗所扮演的主動角色。

不容否定，廢王立武是君權的一次勝利，也就是高宗本身的勝利。李治喜愛武則天的原因，後人只能猜測。美貌自是一點，

<sup>44</sup>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又孟憲實，《唐高宗的真相》觀點大致相同。

<sup>45</sup> 趙克堯，〈武后之立與君相權力之爭〉，《溫州師專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頁89-97。

<sup>46</sup> 楊增強，〈唐高宗廢立皇后事件新論〉，《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頁93-96。

尤其是男女之情能發揮的作用，不易估計。對世事的熟練和見識，也是另一可能。武則天個人在立后事件中無疑起了一些作用，試用財物爭取長孫無忌的支持，是其中較明顯例子。但她無疑只是配角，要說柳奭因為這個不知能否登上皇后位置的人而辭中書令職，難以令人置信；認為她的政治野心與才幹對長孫無忌的擅權造成了威脅，也屬誇張；否則，老臣們自當積極反對。總而言之，李治在廢立后事件中的決定，與他在登基後一段時間中的表現，可以說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在朝廷用人，有本身一套方針，他也願意去運用他的權力，去追求他所喜歡的。且不論他是否明君，以為這段時期的高宗昏懦，卻似是無稽之論。

#### 四、顯慶年間的唐高宗與武則天

武則天登上后座後，很快就在一些朝廷活動中表現自己。顯慶元年（656），即她當上皇后次年三月，她便「祀先蠶於北郊」。<sup>47</sup>後來她至少在總章二年（669）、咸亨五年（674）和上元二年（675）同月，再次行同樣典禮，可以看出她對此事的重視。唐朝過去的三個皇后似乎從沒有行過同禮記錄。但先蠶禮源於周制，隋亦有定制，非武后所創。用唐人的說法，「季春吉巳，祭先蠶於公桑，皇后親桑。」<sup>48</sup>、「季春吉巳，王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sup>49</sup>武后的目的，可能正是希望通過禮儀，「示率先天下」，以求取得稱職的名聲。她在顯慶元年九月所製的《外戚誡》，相信亦有同樣意圖，是她在前一年（即永徽六年）三月尚為昭儀時著《內訓》一篇的翻版行為。這種現代稱為公共關係的手段在顯慶五年（660）春高宗幸并州時又再次見到，當時：

皇帝宴親族鄰里故舊於朝堂，命婦婦人入會於內殿，及皇

<sup>4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5。

<sup>48</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24，〈禮儀四〉，頁910。

<sup>49</sup>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46，〈禮·六·先蠶〉原注，頁1288。



室諸親賜帛各有差，及從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鄉并州長史、司馬各加勳級。又皇后親預會，每賜物一千段，期親五百段，大功已下及無服親、鄰里故舊有差。城內及諸婦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賜物等。<sup>50</sup>

當時得賜物人數多少不詳，但看來並非少數。參考顯慶元年作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子少師的崔敦禮逝世，陪葬昭陵時所得的絹布亦不過八百段，<sup>51</sup>可見武后對這次賞賜的重視程度。

在廣結人緣之餘，武后又刻意提高本身社會地位。高宗幸并州時，武后父親繼去年三月獲配享高祖廟庭後，在唐室舊宅再次得配食，排名且在過去比他高的殷開山之上。<sup>52</sup>另一方面，其母楊氏在女兒得立為后的次月獲封代國夫人，顯慶五年十月，又改榮國夫人，這次是「品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sup>53</sup>〈舊紀〉又提及《姓氏錄》的編撰與武后有多少關係，但值得討論的是，歷年來雖有不少論者均認為武后是修訂《姓氏錄》的主要推動者，然而見於史籍上的有力證據，卻僅得《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三上〈李義府傳〉中的「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心世于見敘，更奏刪正」一句。<sup>54</sup>比較兩書，《新唐書》李義府和許敬宗傳所載獨有資料均不多，部份地方如李義府不憤高宗指責他未能好好管教兒子女婿，舊傳載高宗對他優容，新傳則謂高宗不悅，似有刪改痕跡，加上《新唐書》把許李二人視為姦臣，從二傳中亦可見編者對武后的敵視態度，故上引句是否史料原文又或是編者加筆，不無可疑地方。

傳統史籍多認為武則天的專擅與來濟、韓瑗和長孫無忌三人的慘淡下台有直接關係。先看韓瑗，《舊唐書》卷八十〈韓瑗傳〉

<sup>50</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80。

<sup>5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1，頁2748；而崔敦禮卒年月見同書卷4，頁76。

<sup>5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80，又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303，頁3572所載略同。

<sup>5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81。

<sup>54</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23上，〈姦臣傳上〉，頁6341。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15，所載略同。



直云：

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之旨，誣奏瓊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遂良為愛州刺史，左授韓瑗振州刺史。<sup>55</sup>

同書同卷〈來濟傳〉又云：「武皇后既立，濟等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公，請加賞慰，而心實惡之。尋而許敬宗等奏濟與褚遂良朋黨構扇，左授台州刺史。」<sup>56</sup>這裡所記有關武后事，「抗表稱濟忠公」應屬事實，但說她「心實惡之」，儘管如是，史官亦當無從知道，從中可見執筆者對武后的偏見，至甚惡感，令人懷疑韓傳中所謂「希皇后之旨」，同樣可能是史官片面之詞。事實上，由於與長孫無忌的過節，李義府、許敬宗等人無疑視他為政敵，但因為他的特殊地位不易動搖，只好利用機會，把長孫系大臣逐出政壇。故此，儘管沒有武后在背後的主張，李義府等仍有充份的動機，自己上奏指責韓、來等人朋比為奸。從韓、來二人外放後，許敬宗即升為侍中事看，消除政敵帶給他們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舊唐書·高宗本紀》在記載這些人事變動時，說韓、來二人左遷，是「救褚遂良之貶也」，<sup>57</sup>而許敬宗之為侍中，是「以立武后之功也」，無疑誇大皇后廢立的影響，許敬宗在立武后的永徽六年十二月獲「每日待詔」的恩寵，<sup>58</sup>可以說是他立功的直接報賞，而〈韓瑗傳〉中載韓瑗曾上疏為褚遂良諫，高宗雖不聽，但亦不許韓請歸田里的上表，可見高宗實有意把他留在朝廷。<sup>59</sup>故顯慶元年正月初封太子賓客時，韓瑗、來濟均有名，看來並非偶然。<sup>60</sup>二人後來外放，實由於其他原因多於有關廢立皇后的爭論。

<sup>55</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0，〈韓瑗傳〉，頁2742。

<sup>56</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0，〈來濟傳〉，頁2742-2743。

<sup>5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7。

<sup>58</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5。

<sup>59</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00把此事記於顯慶元年，考後晉·劉昫，《舊唐書》韓瑗傳，繫此事於褚遂良左授潭州都督後不久。然依《舊紀》所載，此事疑應在前一年，即永徽六年。

<sup>60</sup> 見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75。

《資治通鑑》稱二人不僅貶官外放，更遭「終身不聽朝覲」的嚴厲處分，<sup>61</sup>可以估計，李義府等指控的是罪名得以成立。

可惜的是史載此事不詳，按一般慣例，朝廷應當特別委派高官組成審問團，值得注意長孫無忌在此一役中表現。據《新唐書》卷一百五〈長孫無忌傳〉所載，韓瑗是他女婿，而沒有記錄指他曾替韓瑗辯護或求情。來濟出身揚州，但亦曾在長孫無忌領導下監修國史，無疑在政治上屬同一集團，他亦不應坐視不救。<sup>62</sup>長孫無忌的作為當然可能只是記錄不全之故，但不必懷疑，他縱然曾試圖努力拯救，結果未見功效。但與其說長孫無忌政治上影響力大降是因武后的得勢的關係，毋寧說高宗充分發揮君主的權勢更為貼切。韓、來二人外放的同時，已經貶官的褚遂良又再貶為愛州刺史，他可能也瞭解到長孫無忌業已日漸失勢，明白到這時欲再回中央的希望只能繫於皇帝，故此上表自陳，請求高宗顧念往昔之功，值得注意的是《新唐書》記此事後，卻馬上作出「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省」的結論。<sup>63</sup>而《資治通鑑》稱高宗的反應是「不省」，<sup>64</sup>即完全不加察看。所以從韓、來二人獲罪一事來看，高宗無疑認定褚遂良對朝廷不軌，對他不是極度失望，便是痛恨於心。宋代史家把高宗不察上奏的責任推到武后身上，大概又是另一次子虛烏有之作。

高宗在朝廷手握大權的態勢，也可見於顯慶三年（658）十一月他將杜正倫與李義府二人同時外貶一事上。杜正倫的官運可說在高宗朝迴光返照，他在太宗朝時，一度任中書侍郎，後來以漏泄禁中語左遷，中段經歷不清，但顯慶元年三月，他卻從戶部侍郎改為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進同中書門下三品，次年（657）三月兼度支尚書，同九月又接替來濟的位置為兼中書令。

<sup>61</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03。

<sup>62</sup> 唐高宗初年監修國史的有：長孫無忌（後晉·劉昫，《舊唐書》，卷65，頁2454）、于志寧（同書卷78，頁2697）、柳爽（同書卷77，頁2682）、來濟、韓瑗和褚遂良等人。

<sup>63</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05，〈褚遂良傳〉，頁4029。

<sup>64</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04。

<sup>65</sup>因為他自恃資歷老，看不起同時任中書令的李義府，於是「訟於上前，各有曲直。」高宗「以大臣不和，兩責之，」把兩人雙雙外放。<sup>66</sup>李義府次年復歸朝廷，杜正倫則不久去世。李杜不和，說明了二人在政治上大概不屬同一集團，故如果我們把李義府看成所謂武后派成員的話，則不能不承認杜正倫亦可能代表了朝廷中另一股勢力。不管事實是否如此，二人的外放，卻清楚的表示了朝廷中主宰政局的仍然是高宗。否則武后是不會坐視不理的，更值得考慮的是李義府的冒起，其實是高宗一手做成，杜正倫在仕途上翻身亦不能否定得高宗再提拔的可能性。換言之，當時真正在政壇上可以呼風喚雨的，其實只是唐高宗李治。

舊史記顯慶四年（659）長孫無忌的下台，同樣視作是武后的決定。《舊唐書》卷六十五〈長孫無忌傳〉記：「皇后以無忌先受重賞而不助己，心甚銜之。」令人不明的自然是史官何以可以那麼透徹了解武后的心事。<sup>67</sup>《資治通鑑》卷二百將後半句改為「深怨之」，然後又加上「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的敘述。<sup>68</sup>較為特別的是這段具有明顯傾向性的記述既未見《舊唐書·許敬宗傳》，也不見於《舊唐書·長孫無忌傳》，<sup>69</sup>再加上整篇《舊唐書·許敬宗傳》根本未記長孫無忌下台之事，多少令人懷疑《通鑑》這條史料來源出處。不管如何，許敬宗與長孫無忌之間不和大概是事實，武后可能亦樂於見到長孫失勢，只是她在此事中是否主謀，實在頗有疑問。目前有關此事的幾種記載，相信均同出於實錄一源，內容基本上同情無忌，認為他是受許敬宗所

<sup>65</sup> 杜正倫傳見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0，頁2542-2543。在高宗朝官歷又參兩唐書高宗紀。《舊唐書·高宗紀上》載他在顯慶二年九月任中書令參他書或當補兼字。另外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05日子作辛未，與許敬宗為侍中時間同，與兩唐書高宗紀略異。

<sup>66</sup> 參見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2，〈李義府傳〉，頁2767。

<sup>67</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65，〈長孫無忌傳〉，頁2455。

<sup>68</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12。

<sup>69</sup> 參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2，〈許敬宗傳〉及《舊唐書》，卷65，〈長孫無忌傳〉。

誣奏，而高宗不察，致令忠臣受罪。記錄完全沒有提及武后在事中所任的角色，或因後人修飾之故，但參《新唐書》卷一百五無忌傳記，「敬宗揣后旨，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無忌變事」，<sup>70</sup>比較實錄，似乎又是後人的加筆。目前記錄部份不合情理地方，司馬光已有指出。<sup>71</sup>但最不合情理處，卻應該是高宗的反應。一個正處英年的皇帝，何以在得悉國舅有反意之後，只憑一個大臣的一次報告，毫不理會實際情由便讓他全家大小流放。故此不能不考慮其他的解釋。

且不管武后是否真正的幕後策劃，就高宗而論，或許他認為在政治上已經不必再倚靠長孫無忌了。無忌雖然是唐室姻親，但長孫皇后早去世，從高宗妹長樂公主的墓志看來，公主沒有給長孫家留下一男半女，長孫氏的敗亡，並不會令李家有損分毫，高宗於是乘機借故，清除前朝遺老勢力，于志寧同時免職正是此故。《舊唐書》卷七十八〈于志寧傳〉暗示他的失勢也與廢后事有關，但傳中認為廢立后時，「長孫無忌、褚遂良執正不從，李勣、許敬宗密申勸請」的筆法，<sup>72</sup>近乎言過其辭，故前述暗示不見得會是中肯說法。《資治通鑑》所載于志寧在廢后時中立不言的態度令武后不悅，大概亦本源於此。<sup>73</sup>總之，平情權衡當時各方的政治目標和立場，仔細考慮目前所見記載所隱藏的偏見，可能會得出與過去不同的看法，即在顯慶年間的政治鬥爭中，高宗應該比武后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 五、小結：武則天參政的背景

按照舊史說法，武則天的得勢，或者可以分為幾個階段：首階段起始是如《唐會要》卷三所記：

顯慶五年十月，上苦風眩，表奏時令皇后詳決，自此參預

<sup>70</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05，〈長孫無忌傳〉，頁4021。

<sup>71</sup> 詳參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考異〉，頁6312。

<sup>72</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78，〈于志寧傳〉，頁2700。

<sup>73</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記「及議廢王后，燕公子志寧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悅。」頁6312。

朝政幾三十年，當時畏威，稱為二聖。<sup>74</sup>

這裡所記，與《舊唐書·則天皇后紀》所記，「帝自顯慶已後，多苦風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詳決，自此內輔國政數十年，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為二聖」，<sup>75</sup>並不完全相同。從前者所記高宗不適時間與武后參政日子長短均較確切一點來看，應較後者更接近原始記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後者所記中，多苦風疾的「多」，皆委天后的「皆」，可能是為後人妄加的斷語，《新唐書·則天皇后紀》便沿襲了「多苦風疾」一句，但述及奏事時，則謂「時時令后決之，常稱旨」，<sup>76</sup>較接近《唐會要》記錄。另外，《資治通鑑》的記錄則作：「上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sup>77</sup>言外之意，亦是高宗長期有風眩。考慮到《通鑑》的書法，所謂「目不能視」四字，或有可能不是一手史料，而是司馬光根據某些已經失傳記載的加筆。事實上，就史料所見，除了臨終時之前的一段時期外，高宗小病記錄，只有咸亨四年（673）八月一次，當時高宗患了瘧疾，「令太子弘於延福殿內受諸司啟事」，<sup>78</sup>這樣或可理解為高宗身體狀況並不太差。另外，高宗曾在乾封二年（667）九月和永隆二年（681）閏七月，兩次以服餌為原因，令皇太子監國，<sup>79</sup>不過時間相信十分短。另外，咸亨二年（671）正月因幸東都，儀鳳四年（679）五月因不明原因，均分令太子賢國。<sup>80</sup>總之，武后得以參政，與其如舊史說是因高宗長期不適，以至不得不倚靠武后的必然結果，不如說是因高宗健康出現毛病，而使武后偶然得到的參政機會，似更為妥當。

<sup>74</sup> 宋·王溥，《唐會要》（台北：世界書局，1982），卷3，〈皇后〉，頁24。

<sup>75</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6，〈則天皇后紀〉，頁115。

<sup>76</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則天皇后紀〉，頁81。

<sup>77</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0，頁6322。

<sup>78</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59，頁3078。又後晉·劉昫，《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所載略同。

<sup>79</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59，頁3078-3079。

<sup>80</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259，頁3078-3079。



武則天邁向權力中心的另一步，與誅上官儀事可以說有密切關係。《舊唐書》卷五〈高宗紀下〉上元二年三月條的說法是：「自誅上官儀後，上每視朝，天后垂簾於御後，政事大小皆預聞之。」<sup>81</sup>《新唐書》卷一百五〈上官儀傳〉更云：「由是天下之政歸於武后，而帝手矣。」<sup>82</sup>根據這裡的說法，上官儀是個忠臣，他的失勢由始至終均與武后有關。首先是武后好道術，上官儀建議廢后，後來是武后訴冤，高宗後悔，反指是上官儀教唆，最後是武后通過許敬宗下毒手。不過《舊唐書》卷八十〈上官儀傳〉卻完全沒有提到武后，只說上官儀貴顯後，恃才任勢，故為當代所嫉，結果被許敬宗冤枉他與梁王忠有陰謀，下獄而死，兩處所記，頗有差異。<sup>83</sup>《資治通鑑》則採納了《新唐書》所記。<sup>84</sup>參《冊府元龜》卷九三三所記，此事當出於國史，並非來於私史小說。<sup>85</sup>從武后日後所為來看，可以肯定道士出入後宮是應有其事，而高宗因這事而大怒以致廢后，亦是可以理解。因為厭勝之術是古代社會不容許的行為，武則天當年便曾以這個理由打擊王皇后而引起後宮鬥爭，故此這次武后亦知事情不妙，不得不向高宗“申訴”，亦即「解釋求情」之意。不過新書上官儀傳所載另一個廢后的原因，即「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則可能是歐陽修無甚根據的猜測和加筆，而《資治通鑑》所記武后「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作為，動為后所制」，無非是把《新書》所述傳抄和進一步引申。高宗一時衝動，聽了上官儀之言，有意廢后，但冷靜下來，再加上武后的「感情牌」，最終反悔，亦不為奇。<sup>86</sup>事實上，上官儀在與高宗的密議中，大概有如《新唐書》本傳中所記，提出過廢后之議，但他是否說過「皇后專恣，海內失望」一類的話，多少有保留之處。《舊唐書》本傳記他恃才任勢，

<sup>8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5，〈高宗紀下〉，頁100。

<sup>82</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105，〈上官儀傳〉，頁4035。

<sup>83</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80，〈上官儀傳〉，頁2743-2744。

<sup>84</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1，頁6342。

<sup>85</sup> 宋·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卷933，頁10998。

<sup>86</sup> 蒙曼，《武則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100-104。



並不似是虛言，上官儀以文才自恃，與老一輩的才子許敬宗有所不和，並不難想像。他之所以膽敢向高宗建廢后之議，或可能是出於他的私心，希望藉此可以打擊和他同任宰相的許敬宗一派。而《冊府元龜》的記錄並未提及武后是許敬宗陷害上官儀的後台，但不管如何，從上官儀的失勢確實牽涉到一大班官員下台，這不是一場後宮鬥爭的延續，而是另一場朝廷掌權者的政治角力。<sup>87</sup>

由此看來，與其說武后是上官儀事件中的主角，不如說她尋找了一個政爭的藉口和理由，似更為接近事實。她的皇后寶座一度岌岌可危的經歷，相信是令她以後更積極參與前台政治的原因。誅上官儀事在麟德元年（664），換言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自顯慶以後到麟德以前的武則天，仍然未有「政事大小皆預聞之」的能耐，但誅上官儀後，她積極參預政事，經過約十年的歷練後，武則天先取得了「天后」封號，續而與高宗並稱「二聖」。如前引《唐會要》卷三和《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中的「當時」都沒有明記日期，但《新唐書》紀則有更詳盡說法：「上元元年（674），高宗號天皇，皇后亦號天后，天下之人謂之「二聖」。<sup>88</sup>應該指出，「二聖」稱號的出現，並不是高宗與則天所首創發明的，隋文帝與獨孤皇后便是先例。《隋書》卷三十六〈后妃傳〉便稱「（獨孤）后每與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宮中稱為二聖。」<sup>89</sup>《隋書》只謂「宮中」，而武則天的記錄則謂「內外」以至「天下之人」，事實大概亦是名號先流傳宮中，再由宮人傳出廷外。我們不能確定二聖稱號是褒詞又或貶詞，但考慮到公開對皇族不敬的可能性並不太高的因素，這個稱呼背後的意義或可不言而喻。

如果說武則天積極參政是她本身個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而出現的話，則其中一個客觀條件，無疑是李氏皇室的健康。不過論者每多提及高宗，而少顧及他的兒子。前面曾記咸亨四年

<sup>87</sup> 可參韓昇，〈上元年間的政局與武則天逼宮〉，《史林》，2003年第6期，頁40-52。

<sup>88</sup> 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4，〈則天皇后紀〉，頁81。

<sup>89</sup> 唐·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卷36，〈后妃傳〉，頁1109。

(673) 高宗不豫時太子曾受諸司啟事，但太子身體比父親似乎更壞，他的肺癆病早在咸亨二年已令他在京師監國時不能親問政事，四年後更一病嗚呼。<sup>90</sup>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武則天得到機會發揮她的本領。

李氏皇室的健康，或許是武則天積極參政的誘因，但並不能說是決定性因素。武后能夠成為二聖，實在主要是拜李治之賜。武則天吸引李治之處，相信是感性多於理性。我們知道武氏入宮後不久即懷了高宗骨肉，卻沒有明顯地方看出這時她可以有甚麼機會表現她的治國能力。高宗發現武氏具備這方潛質，相信大概是在武氏有機會實際決定奏事以後，亦即是說，在顯慶末年（661）又或麟德元年上官儀事件發生後。當時高宗已經當了皇帝十多年，雖然不能說他已經疲乏以至厭倦，但如果說沒有初登位時一般積極，也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龍朔三年（663）二月，他雖然親自重審死囚，但卻出現了「不盡者令皇太子錄之」的現象。<sup>91</sup>同年十月，他又詔太子每五日於光順門內視諸司奏事。<sup>92</sup>這些都是給予皇太子熟習政事的機會，所以其他皇子沒有份兒。但咸亨二年六月，高宗在洛陽以旱親錄囚徒時，又出現令兒子李賢和李顯分慮諸司和洛州及兩縣囚的情形，這當然不能用以作為高宗疏於政事的証據，不過若認為類似的情形間中會出現在朝廷中，即武則天和諸皇子在慮囚事上一樣，擔起輔助甚或更重要角色，是完全可能的。就目前的記載所見，高宗直至去世前一年，差不多每年均有巡幸，可知身體並不太壞。要解釋武則天的積極參政，以高宗的健康為唯一理由，顯然說服力不足，必須同時注意到高宗的心態，始能找到較佳的解釋。

<sup>90</sup> 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結核歐陽修冤枉武則天〉一文中力證太子李弘是死於肺結核病，而非《新唐書》所云是被則天所毒殺。見《武則天與乾陵》（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頁89-95。而孟憲實亦持相同意見，參氏著，《唐高宗的真相》，頁197-202。

<sup>91</sup> 後晉·劉昫，《舊唐書》，卷4，〈高宗紀上〉，頁84。

<sup>92</sup> 宋·司馬光等編著，《資治通鑑》，卷201，頁6338。

## The Re-understanding of Tang Kao-tsung Political Trickery: Also on Empress Wu within the Reign of Kao-tsung

Lo, Wing Sang

### Abstract

If we do not comply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the Tang Kao-tsung not stupid, how can we explain Empress Wu come to the throne in the future. After Kao-tsung changed the Queen, the court did not form one belonging to Wu's political forces? Were there many difference political views or so-call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Kao-tsung and Wu? In short, what role Wu played within the twenty-eight years of the reign of Kao-tsung. We can even ask, did her experience in these days, whether affect the use of trickery in the day she came to power in future? The paucity of historical data, it made the discussion more difficulties. For pursue a more reasonable answer to re-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Koa-tsung political trickery is necessary.

**Key words:** Tang Dynasty, Gojong toward, Empress Wu

